



抗战时期创办的《共产党人》

193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正式出刊,毛泽东亲自为刊物撰写了发刊词。毛泽东以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为总纲,将中国革命经验凝练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课题。《共产党人》以其鲜明的名称、独特的定位、明确的主旨,从诞生前的历史积淀,到精心筹备、成功出刊,再到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遗产。

王彦军

创办新党刊迫在眉睫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级党组织相继开办了许多党报党刊,对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推动党的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全民族抗战时期,随着国民党“限共”政策加剧,原有党内刊物难以适应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新需求。当时党内存在两种危险:一种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另一种是拒绝国共合作的“左”倾关门主义。《共产党人》的诞生,就是对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正面回应。

20世纪30年代末,国内外形势更趋复杂。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相继攻占广州、武汉,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加紧对根据地残酷“扫荡”,国民党不断制造摩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

矛盾重重。“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暗流涌动。同时,为了壮大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党员,吸收了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员入党,党员数量从全民族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发展到1938年底的50多万人。党员队伍的壮大带来了新鲜血液,但也引发了新问题,不少新党员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严格的党性锻炼,许多新党员在思想上并未完全入党,党组织面临着战斗力下降、倒退的潜在风险。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创办一份专门的党内刊物迫在眉睫。1939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建设伟大的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共产党人》应运而生。

将党的建设置于内容主旨的核心地位

《共产党人》创刊号,32开本的封面仅有刊名、期号和“秘密”字样,内页首篇即是毛泽东亲笔撰写的发刊词。《共产党人》发刊词对过往革命经验进行深刻总结、对未来革命方向作了精准研判。毛泽东明确指出,正是这18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同时强调:“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共产党人》一经创刊,就有着鲜明的

办刊宗旨。以张闻天为主编,毛泽东、李维汉、陈云、王稼祥、艾思奇等人为主要编委的编辑团队,不仅有着丰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而且大多担任着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职位,始终将党的建设作为编辑工作的重心。在栏目设置方面,《共产党人》包括通讯、专载、译文等各个栏目。通讯栏目进一步分为干部教育、支部工作、学习通讯等子栏目,这些栏目以刊发与党的建设相关的文章为重点。在《共产党人》发行的一年多时间里,关于党的建设的文章就有60多篇,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将党的建设置于内容主旨的核心地位。

历久弥新的精神遗产

因为是党内秘密刊物,《共产党人》出版之后,开始秘密发往全国各大党组织之中,发行范围较小,仅在党组织内部秘密传阅,发行总量仅一千多份。因此,对于《共产党人》杂志的保密工作,党中央极为重视,强调:“不论在任何环境,就是在完全是一个党员的环境里,也不应该把《共产党人》像党的一般公开刊物同样看待,应该注意它的安全。”但是在《共产党人》的发行区域上,其所涉及的地区较广,几乎覆盖了每一个有较大的党组织的地方。

《共产党人》起初被定位为月刊,计划每月底出版1期。然而,从1939年12月开始,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出版日期开始变得不再固定,有时每月会出版2至3期,有时几个月才会出版1期。1941年8月,出版至第19期后停刊,前后共刊发文章196篇。虽然办刊只持续了一年零十个月,但影响深远。《共产党人》刊发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扩大的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还刊载了毛泽东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张闻

天、王稼祥、刘少奇、陈云等撰写的重要文稿,不仅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历史作用,而且对党的建设的影响历久弥新。

就《共产党人》发刊词而言,它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8年的基本经验,明确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的建设目标,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部署了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一系列政策措施。从毛泽东强调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到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及至如今“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党的建设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的”,到“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再到“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从建设“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到“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再到“使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都与《共产党人》发刊词的精神一脉相承,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一座丰碑。据《学习时报》

巴金对鲁迅的深厚情感



巴金在鲁迅像前

巴金初见鲁迅

“他永远是我的老师。”这是巴金对鲁迅的肺腑之言。

巴金曾错过几次同鲁迅相见的机会,直到1933年在文学社举办的宴会上,巴金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从许多照片上早就熟悉的人——矮小、清瘦,头发和眉毛又黑又浓,穿一件普通的长袍……只是脸上的表情比照片上更加和蔼、诚恳。

那天晚上在座的有十几个人,都是作家,谈话自然围着本行转,谈到他们的工作、作品、文人。鲁迅比谁都说得多、笑得多。他说话朴素、自然,用词简短、鲜明而又富于表现力,不时露出温和、慈祥的微笑。鲁迅谈到当时创刊的《文学》杂志的内容,谈到他打算写的作品,谈到帮闲文人所起的卑劣作用,谈到国民党愚蠢而又肮脏的宣传手段。当然,不是鲁迅一个人谈。其他人也就这些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不过大家每次都想听听鲁迅的看法。

聚会进行了两个小时。在向鲁迅告别的时候,巴金才发现时间过得真快。

这之后巴金还见过鲁迅。那个时候《文学》杂志经常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制,有几次他们不得不到旅馆去会面,商量对策。他们需要讨论问题的时候,一般到大旅馆去订一个房间,要些酒菜。在饭桌上谈话比较方便和安全。有时他们一坐就是好长时间,直到夜里11点以后才散。

1934年10月,巴金去日本前,文学社的朋友们为巴金饯行,在南京饭店订了一个房间,鲁迅也来了。那天晚上鲁迅兴致很高,谈到日本,谈到当地的风俗习惯,还讲了几个笑话,都是中国留学生由于日语不好闹出来的。饭后他们继续谈天。鲁迅告诉他们他有几个熟人被捕,还说其中有的人甚至无法把信传递给他,言语中难掩担心。

编辑巴金与作者鲁迅

第二年秋天,巴金从日本回国以后,又见到了鲁迅。鲁迅显得有点消

瘦,但仍像以前那样精神饱满。当时文化生活出版社刚成立不久,巴金任总编辑,准备出版“译文丛书”和鲁迅翻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第一部,鲁迅感到很高兴。鲁迅刚完成这部译作,正准备出版画家阿庚所作《死魂灵百图》。

巴金问鲁迅是不是有意写一部关于旧中国社会和旧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什么时候动笔。鲁迅笑道:“想得很多,就是怎么也做不成。”的确,在那个时期鲁迅还准备写《中国文学史》,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

巴金那时正好打算出版“文学丛刊”第一集,便请鲁迅为出版社编一本作品集。鲁迅答应了,几天以后就把这个集子的名称和内容通知了巴金。鲁迅告诉巴金,有三四篇东西应该收进去,可是还没有动笔,只要一写出来就寄给巴金。这是鲁迅的最后一本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

鲁迅刚写完短篇小说《出关》,健康状况就恶化了,巴金估计鲁迅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编成。可是出版社宣布不久将出齐“文学丛刊”第一集的16卷书的时候,鲁迅着急了。一个月之内他就写完了几篇,编好了集子,并且寄给了巴金。

又过了几个月,有一次见到鲁迅,巴金请他再为出版社写点东西,希望“文学丛刊”第四集中能有一卷鲁迅的作品,鲁迅高兴地答应了。过了些日子,鲁迅托作家黄源转告巴金,这一篇题名《夜记》。不久,鲁迅就病了。康复以后,鲁迅一连写了几篇。

然而,疾病和猝然降临的死亡中断了鲁迅的工作。

巴金为鲁迅抬棺

鲁迅逝世以后,巴金接连3天都到灵堂守灵。1936年10月22日出殡那天,巴金和一个朋友早晨7点半就来到了殡仪馆,他一个人绕着灵柩走了一周,又站了片刻。下午遗体入殓,巴金跟着许多朋友行了礼以后,站在人丛中潸然泪下。下午两点钟,巴金和其他15个人把灵柩抬上了灵车。到了墓地已是傍晚,举行了仪式后,大家把盖着白底黑字“民族魂”旗子的灵柩缓缓地放入墓穴。

夜晚10点,巴金疲倦地回到家,接到了一个朋友的来信,说因功课绊住,未能前来吊唁鲁迅先生,但那位朋友说:“他的人格实在伟大,他的文章实在深刻……”

1956年10月14日,鲁迅逝世20周年后,他的棺椁由万国公墓迁往他曾长期生活过的虹口,安葬在虹口公园,即后来的鲁迅公园。这一次扶柩的有柯庆施、茅盾、周扬、许广平、巴金、章靳以等。巴金在为鲁迅移棺时,把“民族魂”的旗子覆盖在棺盖上。

鲁迅逝世以后,巴金在不同的时期多次撰文缅怀他,表达无比的崇敬、无限的感激和绵绵不绝的哀痛。

崔鹤同 据《人民政协报》